

独董制度改革要触及根本性的问题

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华生

本报记者 郝亚娟 上海报道

自康美药业案件后,独立董事的“权利与责任”面临着灵魂拷问,如何完善独董制度也成为资本市场的热议话题,亦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

完善独董制度要触及根本

《中国经营报》:独董制度是从国外引入,但是并没有发挥其当初设想的作用。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华生:我国独董制度是在2001年从国外正式引进,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各个部门都在按照中央的部署与国际市场惯例接轨,尽可能向国际规则靠拢,并建立相应制度。在此背景下,我们引进了独董制度以及国有股减持制度,后者在当时影响更大。

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它的国情与市场土壤,美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发育,与美国证券市场股权分散的进程相一致。更不用说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难简单照搬国外某个国家特殊的某个制度,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再去进行创新和设计。

现在回过头看,由于一些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当时对国际规则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对中国的国情跟国外有多大差异、是否适合直接搬用,也缺乏深入研究。当然应当看到,除了这两个制度走了弯路,我国证券市场做了很多制度引进都效果显著,大大缩短了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的进程。

《中国经营报》:独立董事制度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环境?

华生:独董制度从引进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这20年来它就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总体而言,在我国,独董制度没有国情基础,也没有市场基础,仅仅是为了符合行政部门和法律上的要求。

从制度演变上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设立独董,最初是上世纪90年代为适应国企海外上市的需要,这样就开始建议国内每个上市公司也可设2个独董,后来发展到要求独董人数的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上市公司

11月26日,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征求意见稿)》。12月4日,证监会副主席在公开论坛中表示“证监会已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研究,进一步明晰独立董事权责边界”。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

都是三分之一的“标准最低配置”。

对比来看,美国的独董制度是逐步发育和完善的,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独董的占比从10%~20%,经过了将近百年的发展,现在独董占比逐步上升至80%以上。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成员比例变化,跟美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化的进程是相互适应和匹配的,是市场主体自己内生的需求,而中国现在的情况与美国证券市场在20世纪初之前的百余年是相同的,就是股权还是相当集中,上市公司几乎都是大股东直接控制,没有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并不存在这样的内在需求。

回过头来看,与当年照搬的国有股减持规则一样,独董制度在现阶段也缺乏在中国生长的土壤和国情。以同样在2001年实行的国有股减持制度来说,这一制度实行后,股市出现了剧烈震荡。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漫漫熊市的信号——国有股减持评析”,指出我们不能够照搬西方国家发起人股东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减持的做法和惯例,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在上市初期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强行规定国有股和法人股不流通,10年来已经形成了在价格和产权界定上的重大差异。经历了从2001年到2005年的这段时间,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国务院果断收回了国有股减持的决定,同时党中央决策部署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也是证监会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今,中国股市能够跟国际接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消除了当年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割裂,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基础,所以后来大家的共识都是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既然当年国有股减持办法可以讨论可以撤销,那么,强制性而

根本问题是什么?可以通过哪些调整来“激活”独立董事的职能?针对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独董制度的问题和解决对策,《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华生教授。

又效果甚微的独董制度为什么不可以讨论其取舍和出路呢?因此,我认为研究独董问题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搞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中国经营报》:你提到过“可以考虑废除独董制度”,是基于什么考虑?

华生:一方面,从企业自身角度,没有设立独立董事的积极性。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占比是按照要求不低于三分之一,结果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几乎全按底线配置。这是因为企业设立独董仅仅是为了满足法规要求,不是自愿的,不是自己有内在需求。

另一方面,从政府角度,取消强制性的独董制度也是给市场主体松绑减负,是简政放权的措施之一。独立董事制度是当初缺乏对发展阶段和国情差异认识的情况下,加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头上的,增加了上市公司及股东的负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尽量减少行政上包括法规上对市场主体不必要的束缚,为此,国家也已经取消和废除了大量过时的法规。废除了强制性的比例要求以后,上市公司真有需要,他自己自然就会去做。

从更大的角度看,公司治理是一个大课题,对独立董事制度的重新研究和做重大的修改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比如,从强制性的变成自愿性的,哪种特定情况下必须设立独董,哪些情况下允许自愿设立或不设立。目前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认识和误解太大,对独董的许多期盼和要求完全不切实际。希望监管部门在修订独董规则及在全国人大修改公司法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如果是没用的不可修补的东西,勉强去修补,最终仍然没有生命力。



独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能制衡公司决策层。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普遍“一股独大”,在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独立董事没有立足和发挥多大作用的空间。

本报资料室/图

关键在于谁来代表小股东利益?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承担的权和责是什么?

华生:独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能制衡公司决策层。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普遍“一股独大”,在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独立董事没有立足和发挥多大作用的空间,仅仅是个陪衬。而且通常就是大股东提名的,是因为朋友关系被推荐去的。

另一个现实情况是独立董事总要在每一份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因为按照规定会议开完当晚就要公告,但基本上对公司的具体情况并不很了解。独立董事所看到的东 西,和几小时后投资者、研究机构所看到的一样,敏感数据和内部资料出于信息披露和保密的要求一般也很难提早看到,看到之后马上就要签字,这个责任要求太高了。绝大多数独立董事其实就是一年中赶去上市公司匆匆忙忙地参加几次会议,每次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往回赶。理

想化地指望他们能监控公司治理,是非常不现实的。

另外,我们的独立董事大多是学者专家,有学术知识背景,但是没做过企业。有人总结“学者下海,10个有9个是失败的”,这就说明术业有专攻,人有专长,搞学术和管企业需要不同的特质。现在这方面的认知和要求存在很大的误区。如果一味沿着这个方向去改,最终的结果就是缘木求鱼。

《中国经营报》:如果要为独董规则提出修改建议,你有哪些建议?

华生:独董制度的完善要放在重构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大课题下。我认为,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分类改革,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设立独立董事遵照不同的要求;二是增加市场主体的自主权自愿性。

《中国经营报》:在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方面,你认为,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哪些改变?

华生:重新构造和完善中国

力,需要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听取和综合各方的意见。独立董事虽然只是一个分支,但它原本也是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中很重要的一环。如果这一环改变了,那么公司治理结构就需要改变很多内容。重新设计独董制度,可以有多种思路,目的在于建立能够真正有效地约束公司大股东和约束公司管理层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明白,独董制度并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普遍制度。比如,德国的上市公司就没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构造设计也与中国完全不同。日本受美国影响,谈论独立董事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至今也没做,搞的还是自己特色的“监察役会”。

所以,是独立董事作用大,还是监事会或其他东西更有用,不能教条和迷信,取决于国情和制度设计,取决于谁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和中小股东利益。不触及到根本性的东西,独董制度即使修改了,也作用不大。

数据交易催生金融风控创新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11月25日,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数据资产价值再次成为了业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实际上,数据交易对于银行业的创新发展意义重大。在该交易所成立当天,上海银行在业内率先发布了“基于可交易数据的循环授信方案”;工

数据价值凸显

在银行数字化过程中,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银行获得数据的方式看,数据交易是一条重要途径,而上海数据交易所的成立也就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业内的关注。

在上海数据交易所成立当天,该交易所受理挂牌和完成挂牌的数据产品接近100个,涉及到金融、交通等八大类,并达成了部分首单交易,而银行在其中参与度较高。

据了解,上海数据交易所将汇聚于海量的数据提供方,而采购方能够根据需求进行对接,使得数据在交易流通中产生更大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数据挂牌前交易所将对数据产品做交易合规评估,主要是审查数据合法性与合规性,确保不存在侵犯用户隐私等问题,这对于数据的脱敏非常重要。

“银行在给客户授信过程中,信用等级和风险的评定是基于对客户

商银行则与国网电力上海分公司顺利达成了数据交易,并基于数据资产凭证完成了对首批签约数商数据库科技的融资。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由于银行授信业务的线上化,特定的数据是进行客户画像和建立风控模型的基础,也是数据体现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以

的精准画像,而客户画像则是基于数据完成的。”一家股份制银行高管表示,数据越全面越准确,银行对客户

的风险评估也就越精确。

“然而,现实情况是银行并没有掌握客户的数据。”该高管称,这就需要银行从外部将数据导入。

他向记者透露,银行引入数据的方式有很多,比较常规的是政务类的数据正在逐渐开放,银行与央行征信、国家税务部门、工商部门、社保基金等政府部门合作,在客户授权的情况下获取。“但是,这类数据也比较有限,行业内关注度高的一批数据更多是交易数据。”

“银行曾经试图通过搭建商城等方式积累客户交易数据,相较于互联网搭建平台数据量大却有限,但是这能看出银行对于数据的重视程度。”前述高管表示。

据他所说,很多中小银行不掌

来,商业银行每年的外部数据采购花费巨大,而数据交易所的成立也能够顺利实现数据的脱敏、规避侵权等法律风险,这为银行的金融创新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实现了数据交易之后,银行基于数据的风控创新将更为重要,这也是银行数字化过程中提升竞争力和实现差异化的方式。

握数据,风控上就有很强的依赖性。比较典型的是银行的联合贷和助贷产品。“在互联网贷款新规之前,中小银行主流的线上贷款模式其实都是以联合贷款为主,由于微众银行的微粒贷和蚂蚁金服的借呗、花呗掌握了大量的交易数据和社交数据,中小银行只能够通过这种风险外包的模式运营。对于助贷合作模式来说,部分第三方平台是通过爬虫等技术手段引入数据,可能还会涉及到数据脱敏问题。”

他认为,数据交易所有利于银行获得特定数据,能够让银行在授信上“有米下锅”。银行能够基于不同的数据设计风控模型,实现金融上的创新。

记者注意到,在上海数据交易所首批挂牌企业中,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国家电网、万德等企业赫然在列,而这些企业所能提供的数据也有较大价值。

风控创新分化

“在数据实现交易流通之后,银行的风控创新能力将会加剧差异化。”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认为,面对相同的数据,头部银行在数据的筛选、应用和风控模型的建立上更强,而中小银行很难有较强的大数据风控能力。

该人士介绍,银行的风控模型对于技术的应用和产生的效果有相当大差异。传统的风控模型根据相关要素的核查进行打分,技术含量并不高。以房贷为例,对于贷款人征信的查询就是如此。“创新的风控模型是要跳出强相关的因果关系,以非传统的数据映射,这对数据和数据挖掘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按照他的说法,不同的数据在客户画像中的作用不同,而非传统数据对于客户画像更重要。“比如,个人资产规模对于客户的财富和经济实力是一个衡量标准,但是通过个人消费数据来衡量客户经济实力就属于非传统数据的映射。”

他表示,传统银行信贷的模式就是用抵押资产进行授信,后来银行授信流行查“三表”,成为了企业贷款的一个重要依



上海数据交易所将汇聚于海量的数据提供方,而采购方能够根据需求进行对接,使得数据在交易流通中产生更大价值。

本报资料室/图

据。但是,现在已经可以根据税务、企业员工薪酬放大杠杆进行授信,这就是从不同角度来刻画企业。

“如果银行采购数据后针对数据开发产品,这就比较考验银行对数据的应用和风控上的创新。”平安银行相关人士称,目前大多数银行都在打造生态场景,而场景不仅是数据的来源,也是风控创新的落脚点。

据了解,平安银行的“新一贷”就是一个风控创新的案例,该

款产品是针对拥有稳定连续性工资收入人士发放的消费类无担保贷款,而其判断则以客户每月工资收入为依据。

“银行数字化转型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是银行信贷流程的重构,这其中涉及面较广。头部银行的步伐可能更快一些,而中小银行在数据、团队和资金上是硬伤。”前述股份制银行人士称,不同银行对于数据的需求不一样,这也让银行的业务发力点有所不同,摆脱发展的同质化。